

中央负责同志 同外宾的谈话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华国锋同志同英国作家格林的谈话……………（1）
（1979年9月11日）
- 华国锋同志答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问……………（15）
（1980年7月）
- 邓小平同志谈台湾回归祖国等问题……………（25）
（1979年1月5日）
- 邓小平同志同英国作家格林等的谈话……………（29）
（1979年10月15日）
- 邓小平同志谈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和前景……………（41）
（1979年11月26日）
- 邓小平同志谈我国经济政策和远景规划的
设想……………（53）
（1980年5月12日）
- 邓小平同志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
法拉奇的谈话……………（57）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
- 胡耀邦同志同外宾谈我国形势和政策……………（69）
（1980年4月）

- 胡耀邦同志同南斯拉夫记者的谈话…………… (84)
(1980年6月13日)
- 赵紫阳同志同外宾谈我国政治经济改革…………… (90)
(1980年9月12日)
- 彭真同志同外宾谈我国政治经济改革
和法制工作…………… (104)
(1980年10月19日)
- 胡乔木同志同外宾谈毛泽东思想根本出
发点和社会主义特点…………… (111)
(1980年9月4日)
- 姚依林同志同外宾谈我国的计划、教
育和人口等问题…………… (119)
(1980年10月2日)
- 杨静仁同志谈民族问题…………… (125)
(1979年9月24日)

华国锋同志同英国 作家格林的谈话

(摘要)

1979年9月11日，华国锋同志接受英国作家兼制片人费里克斯·格林的电视采访，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费里克斯·格林（以下简称格）：我知道你不大喜欢谈你本人的情况，但我还是想问几个这方面的问题。你童年时的家庭情况如何？

华国锋总理（以下简称华）：我的老家是山西省交城县。在我6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家有母亲和哥哥。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13岁小学毕业后，因升不起中学就失学、失业了。我14岁进入本县新办的职业补习学校，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

格：你参加革命运动和你参加抗日战争时的情况，你是否可以向我们谈谈？

华：我是在1938年17岁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当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入山西，国民党的军队溃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县的山地是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四周有敌人据点。斗争很残酷，敌人每年多次大扫荡，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我们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我较长时间在本县工作，任抗联主任、武委会主任、县委书记，活动在山地平原抗日斗争的前线。

格：战后，你去湖南省，并负责当地的一项大型的灌溉和水力发电工程的规划和建设工作，你能不能同我讲讲当时的情况？

华：我不是战后去的湖南。我是1949年春随大军南下。我们7月进入湖南，8月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我在湖南工作了23年。1965年我在省委工作的时候，省委分工要我担任韶山灌区建设工程的总指挥。我们动员了10万人，用了10个月的时间，建成总干渠和北干渠，1966年6月1日正式放水受益。这项工程是以灌溉为主，可灌田近六万多公顷，并可发电、拦洪、通航、发展养鱼。经过十多年来的考验，证明效果是比较好的。

格：我看到了那个灌渠的照片。我觉得，工程很宏伟。我想问，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

席的？

华：毛主席常去外地视察工作，也常到湖南来。因此，我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向他汇报工作。我记得是在五十年代初，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

格：我想你是在1971年被召到北京的。这次调动是否同处理林彪一案，处理他妄图推翻毛主席一事有关？你调查的结果如何？

华：我是1971年2月调国务院工作的，分管农业、财贸工作。到国务院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为了让我熟悉全国情况，派我到南方各省去作些调查研究。所以，我的调动同处理林彪事件，处理他妄图推翻毛主席一案没有联系。

格：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是在1976年逝世的，这段时间对中国是否是十分危急的关头？

华：1976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接受严峻考验的一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是在他们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此站起来了。他们的相继逝世不能不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四人帮”利用这个非常时刻，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活动。这是关系到我党我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将向何处去？是坚持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还是被“四人帮”篡夺领导权，实行法西斯专政？这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时刻。不仅中国人民忧心忡忡，外国朋友也为我们耽心。

格：你是在1976年4月出任总理和第一副主席的，是谁选你到这些岗位上去的？对于担负这些巨大的责任，你当时有何感想？

华：1976年，在周恩来同志逝世后，毛泽东同志采取了非常的措施。他先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我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以后，在当年4月，毛泽东同志又提议我任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对我来说，特别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个十分艰巨的责任。我曾向毛泽东同志表示，我政治思想水平低，不能胜任，请他再加考虑。但他坚持他的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这一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

格：你担任总理半年之后，“四人帮”即被逮捕了，这是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

华：要作出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的决定，当然是不容易的。王张江姚四个人都是政治局委员，一个还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妻子，他们进行阴谋活动多年，这是不能不考虑的。但是，毛泽东同

志生前已经在政治局揭露和批评了他们搞“四人帮”，有野心，决定要处理他们的问题。他们在政治局和党内实际上已很孤立。在人民群众中，他们已丧尽人心。特别是在1976年毛主席重病和逝世以后，“四人帮”猖狂地进行阴谋活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已是箭在弦上。同时，在他们的煽动破坏下，铁路运输中断了，不少工厂停产了，整个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当时我们再不下决心不行了。这年10月6日，我们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很顺利地粉碎了“四人帮”。

格：当时“四人帮”究竟获得多大的支持？有没有爆发内战的危险？

华：原先，我们估计在他们经营了十多年的上海，可能出点乱子。结果，大乱子没有出，中乱子没有出，连小乱子也没有出。在我们尚未正式公布消息之前，社会上已经在流传“除四害、讲卫生”，人心大快，大快人心的说法。上海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就象火山爆发一样。六百多万人自动上街游行，欢呼这一胜利。我们没有放一枪，没有流一滴血，就解决了问题，全国稳定。这也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当时“四人帮”所拥有的支持有多大。

格：许多人问到“四人帮”现在的情况。你能否向我们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华：我可以告诉你，“四人帮”现在还活着，当然被关起来了。他们照样吃饭，睡觉。我们不会学他们残害无数干部那样，虐待他们。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弥天大罪，将受到彻底的清算。

格：这是不是说可能要审判他们呢？

华：我们是要经过法律程序来处理的。

格：现在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今后再有一个集团篡夺权力？

华：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提供了对待这一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在全国开展了对他们的揭发和批判，清算了他们的阴谋活动和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因此，今后如有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再想打着革命旗号欺骗人民，就不会那么容易得逞了。

两年多来，我们还落实了被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我们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大规模地平反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我们还根据中国粉碎林彪、“四人帮”后的新的历史情况，提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任务，从今年起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

建设上来。我们已迅速扭转了经济形势，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使遭受严重破坏的科学、文化、教育等事业也都恢复了生机，欣欣向荣，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我们还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作了很多努力。特别是在今年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我们通过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发挥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使人民公仆不致于成为人民的老爷，使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活动得以及时揭露并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认为，我们已经和正在采取的这些措施今后能够防止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兴风作浪，篡夺领导权。

格：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你对这场革命的积极和消极结果，目前作何评价？

华：文化大革命本来是从反修防修出发，目的是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更好地得到发展。但是，当时对国内政治形势和党内的的问题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特别是，这场运动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

坏。这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建国以来一次最严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内影响重大，对国外也有影响，我们要认真加以总结。但有一些问题，还要进一步弄清楚。因此，党的三中全会认为不要急于匆忙地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全面的总结，过一段时间，将会看得更准确一些。

格：西方有许多人认为，毛主席的许多思想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被摒弃，你对此有何看法？

华：西方有人说我们正在“摒弃”毛主席的许多思想。据我们所知，还有人说我们是搞“非毛化”。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只要稍稍了解一下中国当前的实际，就会看到，事情恰恰相反。林彪、“四人帮”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鼓吹“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党内有个资产阶级”、“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唯心主义的、极端错误的谬论。我们在全中国揭批了他们的谬论。我们并提倡完整地、准确地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正是为了澄清是非，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全中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是毛泽东同志所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观点。这是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我们高度评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认为这使毛泽东同志长期倡导的上述原则得到了恢复和实践。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伟大功勋。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没有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

格：西方人注意到你们现在非常强调考试。而突出较有才华的学生就会造就一种新型的精神贵族。你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危险？

华：有人错误地认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考试。考试作为帮助和促进学生学习的一种方法，这是可取的。毛泽东同志就从来没有反对过考试，他只是反对那种刁难学生，搞突然袭击的不合理的考试方法。而“四人帮”却大肆宣传考试交白卷是“英雄”，他们蛊惑青年学生不读书，不学习，造成学生荒废学业，程度大大下降，以致我国现在人才青黄不接。两年来，我们重新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包括考试方法，促使青年们努力学习。这对我们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以实现四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至于产生精神贵族，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但我认为精神贵族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让那些勤奋学

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上学的结果。精神贵族的产生是社会制度和相应的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然要尽可能让各方面特别有才能的人得到培养和造就，并发挥其特长，这对我们国家和社会都是有利的。由于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我们还不可能建立足够多的高等院校使全体青年都能受到高等教育，而只能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但是，我们一贯坚持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德就是要有社会主义觉悟，为人民服务；智就是要有文化科学知识。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除了正规的学校外，我们还举办了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包括工人大学、业余大学、业余学校等，不仅使劳动人民的子弟，而且使工人、农民本身都得到越来越多的受教育的机会。我相信，这就有利于防止发生少数人垄断知识的情况。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和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相应的措施，使我们有可能防止产生精神贵族。

格：中国现在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通过实现其现代化规划来“赶上”西方。许多人很想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力图如此快地做如此多的事情。这样强调速度的原因何在？

华：从根本上说，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

产力，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很大的满足。

中国的经济原来十分落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又使我们损失了十年非常宝贵的时间。两年多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了一些发展。但是目前我们的经济还远远不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我们不得不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加紧建设，把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而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我们还相信，一个国家落后，那是容易挨打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世界局势的稳定，对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利的。我们必须加速实现四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格：对于中国迅速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一切进口物品的支付能力，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外国商人对于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指望同中国进行数量可观的贸易，已经由希望过高转为持怀疑态度了。你是否愿意就这个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和主要的是靠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各种优越条件。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这是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基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决不闭关自守，而要努力学习一切外

国的好东西，有计划地引进我们迫切需要的先进科学技术，吸收外资，这有助于我们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近两年多来，我们同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了相当数量的贸易交往。我们还要继续有计划地扩大同外国的贸易和经济交往。我们充分考虑了自己的支付能力。不少引进的技术设备本身就可增加生产出口产品。我国人民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愚笨，我们有大宗农牧副产品，有石油、煤矿、各种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等富足资源，我们还有规模可观的工业，这就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支付能力。

格：你不认为“现代化”可能会导致中国某种形式的“西方化”，并且引起随之而来的一切问题吗？例如机器代替了工人。难道这不会使你们的失业问题加剧吗？

华：我想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搞现代化有两个前提。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二是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不仅毫不矛盾，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必然会导致西方化或资本主义化的任何根据。我们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当然可能会带来一些西方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我

们相信，我国人民能够区分好坏，抵制和克服那些不良的影响。

我国人口众多，就业问题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搞现代化建设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就是从中国人口多的这个实际出发的。我们既要发展现代化大型企业，也要发展中小型企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是自动化、机械化和手工业生产并存。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真是百事待举，前景十分广阔。最近，我们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发展城市各种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由于过去十多年经济和其他事业发展缓慢而造成的部分待业人员将陆续得到安排。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业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妥善解决。

格：有些批评者说，中国当前工厂和公社中的新的权力关系正在剥夺劳动人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其结果是，容易发展起一批新的工业权贵。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华：我不知道那些批评者所说的新的权力关系指的什么。在今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我们决定由职工选举企业、事业单位的基层领导人员，在企业中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企业领导人要定期向大会报告工作并听取意见。在农村由社员选举人民公社的各级领导人员，等等。这许多措施都在逐步施行之中。

这些都是要保证劳动群众当家作主，参预各级管理的权利。

格：香港问题是英国和香港的人民非常关心的问题。你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规划中，香港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华：我认为，有很多事香港是可以做的，因为香港具有一些有利条件。香港和我国内地有着传统的密切联系。香港同胞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香港是亚洲的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自由港，这些年又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和技术。现在我国同英国和香港当局的关系都不错，我们相信，只要双方共同努力，香港和我国内地发展经济合作关系确是大有可为的。这对双方有利。

（已刊 1979 年 10 月 18 日新华社新闻稿）